

事实又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完成侵略中国的战争之一环。因此夺去了约1 000万以上中国人民的生命，掠夺与破坏了达500亿美元以上的财产。同时也给日本人民造成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灾害，败战后经过了9年的日本，现在仍然处在美帝国主义的桎梏下过着奴隶的生活。对这一点他也是应有责任的。

(1954年11月25日于抚顺。)

伪金川县金井参事官的暴行片断

宫宪斌

伪满康德2年我在金川县样子哨(县城所在地)县立一校和二校作了一年小学教员。直接间接知道参事官金井信一郎的一些情况，现将回忆所及，略述如下：

金井参事官是个面孔黑瘦，连鬓胡子，眼睛有些弯，中等个子的人。日常总是一副身穿洋服、头戴礼帽、脚穿皮鞋、腰束武装带的奇怪打扮。据说在东北沦陷前就多年在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串旅馆卖毯子，因此中国话很好，自称是中国通。家住金川县署前院东厢房，家中只有一名姨太太，作县署的打字科员。但金井不许人称其为太太，声称是他的小妹，应当叫小姐。这就是人所周知的“金小姐”。一次金井要索一名木工给他修理屋子，木工不知叫小姐，错叫了一声太太，他就大发雷霆，把木工打了个鼻青脸肿，愤愤地说你的小妹都是你的太太吗？八格亚鹿。

他就任参事官后，经常向周围官吏吹嘘说他是国务院特任的，表示自己有根底，当一名区区的参事官是大材小用了，誓

时将就而已，一有机会就直上青云，因此对一切都是无所谓的一天在省公署发来的很多文件中有他一份任命状，是省里任命的。那时孙步瀛是文书股长，上级来文都由他拆封、处理，见到参事官的任命状，就身送去，当时金井一看，拆穿了西洋镜，就把任命状接过来，三把两把撕了个粉碎，嘴里还不住地骂道：什么东西，乱七八糟，八格亚鹿。以后上司知道了这种情况，可能是申斥了他，他认为这件事别人不知道，一定是孙股长暗告了他。因而对孙股长怀恨在心，千方百计刁难孙股长。使孙股长很长时间无法工作，跋前疐后，动辄得咎。

他常骑马游行，遇见他认识的下级，就早早把腰板拔得溜直，以便接受敬礼后好还礼。特别是遇见警察学警等，就更加扬眉吐气地在等着敬礼，如果对方毕恭毕敬地向他敬礼了，他就在马上用马鞭当洋刀来撒刀回礼。如果对方不认识他或没看见他而没有给他敬礼，就下马一顿毒打。来个“就地正法”。

有一次教育股长张金泉陪他坐汽车出去巡视，走到杉松岗，村长率很多人排队欢迎他，请他到村公所休息。村公所门旁挂了七八个牌子，大概这个村长也有些好虚荣，把一些什么附设息讼会啦等等能牵拉到的不关重要的都写了牌子挂上了。哪知参事官一看就火了，自己上前亲手把一个一个的牌子都给摘下来扔到大道上，末了只剩一个村公所的牌子，嘴里还不住乱骂，八格亚鹿。当时张股长附耳小声告诉他这不是金川县管境，是辉南县管境。他大声说“我是金川县的大官，辉南县我也管着了”。虽然这样说，可没有进屋，返身上汽车，开回金川了。实际他确实弄错了，误认为是金川管境。在临上汽车时小声告诉张股长：“村长吓坏了”。

有一年的三伏天，县公署要在迎门处新建个大花坛，移植花草树木，同时要改修许多房间，于是找了不是少木瓦工和力工

来干活。如果遇有迟到的工人，就叫他们站队，等着挨打。当时县署有个烧茶楼的工人，体格魁梧，高大肥胖，巴掌像小簸箕，参事官让他当“山宾队长”（打人的队长），迟到工人排好了队，让他每人打一个嘴巴，打到头回来再重复打。后来又改变花样，叫工人站一个圆圈，让山宾队长先打排头的作为示范，然后排头打第二人，第二人再打第三人。如此轮流到排尾，排尾再打排头，谁不用劲打就叫队长打谁，这样循环不息，到参事官认为满意为止。过一个时期嫌工人相打，总不免有人藏奸，就又另想办法，调来一个班的学警（正在警察教练所学习的学员），让他们排队走到工人的对面，走着打。第一个学警带头把工人每人一个嘴巴逐个打下去，第二个第三个都这样照样打下去，学警是几个，每个工人就领到几个嘴巴。学警人数的多少，要取决于所犯错误性质的轻重和参事官的高级心理，真是世界罕见的独特打人法。

当时金川县由省发来了两台载重汽车，成立了宣抚班，由县长和参事官分别担任正副班长。以下有几名科 longest 为班的成员，坐着汽车，载运一批火柴食盐，到各乡镇宣传“王道乐土”，对一些困难户给点火柴、食盐，算作救济，这种巡回宣传叫作宣抚。

县署行政科李科长是个擅长文牍的旧官吏，年纪较大，不会奉承，并且有鸦片嗜好。出门自己带烟枪，也是宣抚班的成员。从凉水河子宣抚回来，得了感冒，有些咳嗽，第二天请了一天病假。参事官很早就想敬他，没有机会，这次可是正中下怀。当李科长病好上班时，参事官问他病好了吗？李科长说好了，还有些咳嗽。于是参事官假惺惺地打电话给他请来了日本守备队的医官。先让医官到他的会客室里喝了一顿酒；可能这时已经定好了计，然后把李科长找来，给介绍一番，说医官是

日本东京医科大学毕业，医术高深。医官诊察后，说是第三期肺结核，病情严重，不能工作，只好休养。参事官听说是肺结核，一下子从椅子上跳下来，特别吃惊地问：第三期肺结核？你的诊断书的给！医官郑重其事地开了诊断书盖了印，告辞走了。参事官送走了客人回来，对李科长说：“哎呀，第三期肺结核，厉害，快快的死了。李科长怎么办？”李科长忍痛地说辞职吧。参事官说：好的，你的辞职愿的写吧！回家死比在这死好。当李科长辞职临走的时候，蒙参事官的“恩典”，又领了两个月的退职金。哪知就在告辞的时候，参事官又刁难他说：“告我的黑匣子是不是你写的？”当时把李科长吓得双膝跪倒，百般解释，才饶了卷。第二天一上班参事官就下命令，通知总务科，李科长是第三期肺结核，是传染病，他经办的文件别人不许接手办，他用的桌椅都要抬出去晒晒，实行日光消毒，这样“正大光明”地把李科长撵走了。

金川县长属文英的六弟（名不详）是山城筑日本守备队的密探，住在金川县哥哥的公馆内住，与县署各科长来往也很密切。经常打牌打麻将，逛窑卖新（当时公开卖鸦片烟的地方，开灯供奉，并有很多女招待陪伴客人），人皆以六老爷呼之。

县城东南十几里是大椅子山村，接近森林，有警察队一个中队长期驻在。中队队长随警携带一名野鼓，克扣军饷，供其吃喝玩乐，纵情挥霍。久而久之，加以队长性情暴躁，激起兵变。全队士兵，半夜将队长和野鼓扣了（土匪暗语“枪毙”），然后拉队上山当胡子去了。事后两天才发现，金井参事官接到情报大发雷霆，认为老百姓不报告，一定全村都通匪。与驻金川日本守备队野条次队长商量，要袭击大椅子山村。实际当时正是农民忙犁头遍地的时候，而且谁愿意多管闲事，哪里是全村通匪呢。

当时六老爷在南澡塘洗澡，背地议论几句，不想却暗地被人报告了。于是很多守备队士兵，排队各处搜捕六老爷。不但县长公馆，就在上班时间，也公然闯进县署各科局搜查，但始终不见踪迹，参事官无奈才告诉周县长：“快快把六老爷交出来，我的说话，关系的没有。等守备队搜出来，我的没有法子说话了。危险的大大的有。”周县长没有办法，不得不把藏在公馆里的六弟交给守备队带走。在金川守备队看押不久，又随野条大队的移防，带到孤山子监押。

参事官常安慰周县长说他已和野条大队长说好了，几天就放回来了。可是直到阴历六月末还没见六老爷回来。参事官又说如果送些礼物，可能早日释放。周县长营救弟弟出狱心切，尽管参事官说没有关系，但总担心怕有性命危险，就买了很多汽水、啤酒、糕点、罐头以及鸡鸭鱼肉等，分装两大汽车，交给参事官浩浩荡荡运往孤山子守备队慰问去了。周县长只以为这回弟弟很快就回来了。哪知参事官到守备队说礼品是自己慰问的，不但不说是周县长买的，相反又说周县长很多坏话，暗中催促野条早日处死六老爷。回县又对周县长说守备队接到礼物很乐，三两天就放六老爷回来。事隔多日，周县长接到孤山子警察署长的来信，叫去为其弟找尸首。原来六老爷被用开水灌死了。

几个月来周县长为了弟弟费尽苦心，花费了大量的金钱，但六弟却仍死了。周县长含悲忍痛掩埋了弟弟，回想自己的受骗经过，遂对金井参事官恨之入骨。

周县长的不满意是金井参事官所预料到的。于是从中挑拨，对野条大队长说周县长因弟弟被害，对守备队怀恨在心，很可能有反满抗日的思想。在取得野条大队长的支持后，回县就停止了周县长的工作。在县署后院周县长公馆门口，派学警设双

岗把守，发给门岗登记簿，登记出入人员的情况，命令周县长只准在公馆休息，不准外出或接见任何人。每天只许炊事员上街买两次菜，但出入均须严加搜查，不准携带片纸只字。另外通知岗哨遇有意外情况或有人要见县长，均须随时报告参事官。

与此同时，也将峰谷副参事官停止了工作，但没有监禁。峰谷一天到晚溜溜达达，倒很是逍遥自在。这时金川县县长的工作和副参事官的工作，都由他一手包办。刻了一个大长条戳子，交错竖列三行字，“金川县县长代理，金川县参事官，金井信一郎”。一切下行公文都盖这个戳子。据说上行公文还照旧分别盖周县长和他原来的官印。

一个多月以后，才被省里发现了。第一天把金井调省，第二天才把周县长和峰谷一同调去。审查结果，受害者无罪，另行调动工作。后来，周县长调任梨树县长，峰谷也转勤其他县了。对金井信一郎这个残暴的法西斯分子，日本殖民统治者不得不判处徒刑，用以缓和民众的极端不满的情绪。

(遵化市政协供稿)